

一座座山川紧相连

■文清丽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早晨刚睁开眼，大哥就发了一张他与文旭在机场的合影。大哥说，他这是送文旭去青藏兵站。

一看到“青藏兵站”几个字，我感觉自己的手都微微颤抖了。我想到了绵延青藏线上那越来越高的海拔，想到了那一座座山川紧紧相连的壮美，也想到了青藏线给予我和我家人特有的馈赠……

我拨通大嫂的电话。大嫂显然刚哭过，语气充满嗔怪。她数落着“一根筋”的文旭，又数落着暗地里支持文旭上高原的大哥。

我本想说，作为军人能去青藏线锻炼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！但我怕惹大嫂不高兴，便安慰她说，青藏线不像图片上那么美，也不像外面说的那么苦，它跟全军所有部队一样有苦有乐。安慰了大嫂，我又给大哥打电话。身为老兵的大哥，对儿子能上高原，显然充满了自豪。大哥说：“这是军人的荣耀！”

听了大哥的话，我内心竟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。说起青藏线，我妈去过好多次。一个农村老太太拿着一张写有部队番号信封，从家乡火车站出发，一路上倒了六次车，找到了二哥在西宁的部队，又通过门口哨兵，联系上了距西宁100公里外正在运送物资的二哥。我妈本来是可以发电报的，可她舍不得花钱，她说只要有地址就能找到她

当兵的儿子。正是凭此念，我妈拿着另一个信封上的地址，又找到了在华山脚下当兵的我。

二

我把电话打给二哥。二哥听到文旭上青藏兵站的消息，沉吟半天说：“他去了我的老部队竟然不告诉我，这小子，有种！”

二哥的话，让我的眼角忽然湿了，我想起二哥当年写的一封信。二哥是上世纪60年代末参军到青藏高原的。在那个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地方，二哥一待就是30多年。二哥的兵之初是在昆仑山下的一个黑山沟里，那里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部，也是“丝绸之路”的唐蕃古道要塞。部队驻扎在崇山峻岭之中，抬头只能望到两山之间的一线天。二哥给家里写信说：“当兵太苦了，喝的水里有虫子，山上四季都是积雪。因为缺氧，嘴唇都是紫的。一旦得个急病，基本就没命了。”我妈听了，眼泪流得止也止不住。我爹让上中学的姐姐给二哥回信，问是不是就他一个人在高原上当兵，要是还有另一个人，他就不用怕！二哥从此便再没诉过苦。

在高原上执勤，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。有一次，驻地连降暴雨，河床决堤，外出巡逻的副连长和两名战士突然没了消息。二哥带人顶着大雨在昆仑山里艰难搜索，一走就是几十公里。等找到副连长时，被泥石流紧紧裹挟的副连长已经牺牲了。二哥他们流着泪，脱下军帽，向牺牲的副连长默哀。后来，二哥让战友把副连长的遗体架到自己背上，一路踉踉跄跄地背回了营区……二哥说，所幸另外两名失踪的战士找到

时，人都平安。30多年里，二哥和他的战友们驱车行驶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、大部分地段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一半的青藏公路上，翻越唐古拉山不下200次。

1998年夏天，我随部队组织的军旅作家团到青藏线采风。车一过唐古拉山口，我便头痛欲裂，想起二哥说的在青藏线头疼就用背包带扎紧头部，我便也找了个带子把头缠上。在车上，我们边吸氧边看着外面的风光，我想从前的高原战士不可能像我们这般幸运，在车里还能抱着氧气袋。到了那曲，同行的一位女编辑难写得差点写遗书，我也被折磨得睁不开眼睛。那时，我突然懂得了二哥为什么比同龄人苍老，也明白了二哥对自己受的苦为啥在后来的家信中只字不提。

2010年10月，二哥从青藏兵站调到广州。一年后部队调整改革，二哥所在单位集体转业了。二哥说，他们告别军旗时都哭了……二哥退休后，仍保持着在军中的习惯，每天跑步一小时，休息片刻，再做300多个俯卧撑。有一天，他听到李娜唱的《青藏高原》，神情极其认真地跟他的孙子说：“火娃，快长大，爷爷好带你上青藏线。”

三

三天后，我到青海参加省作协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。那天下午，我打车到了青藏兵站，想趁热看看文旭。

在兵站门口，凝望着哨兵守卫的熟悉的大门，想起二哥当年的家信，就是从这走进我的心间。还有二哥从这里寄出的一张汇款单，变成了家中的一袋袋化肥、一件件新衣服和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，复兴之源

上世纪50年代，“战士作家”高玉宝因创作同名小说《高玉宝》而享誉全国。

我和作家高玉宝相识于1974年，他赠予我的第一本书就是《高玉宝》。此后40多年，我们联系颇多，交情深厚。我所了解的高玉宝，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岁月，都保持着一个战士的本色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1947年，20岁的高玉宝参加了解放军。参军前，他只上了一个月的学，就被迫去给地主放猪，给日本鬼子当童工，后来又学木匠……苦难的少年经历，让他格外珍惜眼前的新生活。一天，他见身边老兵缴纳党费，他想都没想，立即从自己的津贴中拿出几张纸币递给收费的老兵。老兵说：“你还不是党员呢，不收你的！”高玉宝惊讶地问：“党救了我，让我当了兵，我怎么还不是党员？”指导员赶巧经过，就说：“小高，当兵并不等于入党啊！想入党，就写入党申请书。好好干吧！”他马上说：“入党申请书怎么写？我也不会写啊！”指导员说：“你心里怎么想，就怎么写。”

“我从心眼儿里要入党！”这是高玉宝迫切要向党表达的心愿，他要加入到党组织，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。可这几个字，他多半都不会写，怎么办？他就画成和文字一样意思的图画，表达心声。“我”字会写，“从”字当时是繁体字，不会写，他就画了一条虫子代替；“心”字，就画一颗心；“眼”字，就画个眼睛；“里”字，就画了一只眼；“要”字，写了个同音字“咬”；“入”字，方言发音“yu”，他就画了一条鱼；“党”字，他就画了一个树上挂的铃铛……于是，一份特别的入党申请书，在高玉宝手中诞生了。

1948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，高玉宝郑重地向连队指导员递交了自己的“入党申请书”。交上入党申请书刚三个月，高玉宝就如愿加入了党组织。

“党是妈妈我是娃，叫我干啥就干啥，不折不扣不讨价，永远听我妈妈话。”还不怎么会写字的他，就编了一个顺口溜，表达对党的忠贞情怀。这以后，他逢人就高兴地说：“我有家了！”

10年前的一个盛夏，我陪同某厂领导班子成员到高玉宝家，请他给上党课。他讲到“塔山阻击战”那场惨烈的战斗。那天，团长让他去九连连送达命令。当时，敌轰炸机从头上飞过去，他便一路小跑到九连。九连官兵正在吃饭。他一去，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。他传达了团长“六号阵地没人了，九连要赶快上”的指示。九连指导员手拿吃了一半的高粱饼子，对大家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：“同志们！大家要吃饱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顿饭了！”“九连上去后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阵地保住了，可九连同志全牺牲了……”高玉宝说到这里，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。

高玉宝所在的35团，经过六天六夜的阻击战，只剩下百十人；被授予“塔山英雄团”的34团，仅剩21人。高玉宝在心里暗自说，战友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，今后我要用生命去捍卫胜利果实。高玉宝跟随大军南下后，利用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学文化。每次分发完报纸、信件，他就把枪架在一旁学认字，不时地拿起铅笔头在草稿本上写写画画。高玉宝曾经讲过，他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完一部书的初稿，那一年他24岁。书籍经解放军文艺社编辑细心指导修改后，准备公开发行，但书名叫什么一直没有定下来，是罗荣桓元帅一锤定音说，书名就叫《高玉宝》嘛！

高玉宝先是在军内流传，1955年4月正式出版。几家出版社印了近两百万册，一下子轰动了全国，高玉宝也因此被誉为“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战士”。

后来，这个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战士被请到全国各地做报告，一讲就是70多年。当年听他讲革命传统的孩子，如今都已年过半百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高玉宝曾感慨万分

战士本色

■胡世宗

地跟我讲，他在一所小学给孩子们讲自己当童工，饿得不行，没有饭吃。有一个孩子就问他：“没有饭吃，为什么不吃饼干啊？”他一时被“问倒了”。

今天的孩子们，很难理解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，他说自己有义务下功夫给孩子们讲清楚……我当时还写了篇特稿《高玉宝和90年代的红领巾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这篇文章还获得了“当代共产党员风采”征文一等奖。

高玉宝的老式军装前襟挂满了不同时期的奖章，但他始终都保持着一个兵的本色。一次，他被邀请去本市一个单位做报告。年过古稀的他，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。他在干休所领导知道后，担心他的安全，给他派了车。他却说：“我社会活动多，不能总派车。再说，我骑车很方便！”

有一年春节前，我去他家做客，见干休所院子周围了一圈人，多是老太太、小媳妇，中间围的竟是高玉宝。只见高玉宝戴着老花镜，骑坐在长条凳上，正给大家磨菜刀！他在刀刃处点了些水，两手按着菜刀，一下一下地磨着。半天下来，竟磨了五六十把刀。有一个老太太的刀把裂开了，他不仅给磨了刀，还修好了刀把。那天，高玉宝领我看了他的小仓库，里面不只有老虎钳子等修理工具，针头线脑、铁皮钢钉啥都有。有个老干部的热水器喷头坏了，买个合适的，他就给重新做了一个；有个老干部的炉盘三角座坏了一角，他也想法给修好了……

高玉宝的初心，仍是一颗战士的心。他说自己一直记着1952年9月30日在怀仁堂的国庆宴会，他举杯给毛主席敬酒时，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战士作家高玉宝同志。”一句“战士作家”，让他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一个兵！

这么多年，他更没有忘记在塔山阻击战中倒下的战友。2019年建军节，他为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一下捐出10万元积蓄；他没有忘记在张家口作战时，救过他命的团参谋长李文斌。他家中一直摆放着李文斌的黑白照片，照片前是高玉宝自己打造的一把八路军战刀。战刀上刻着李文斌的英名和高玉宝题的赠诗：“虎将挥虎刀，霜刃鬼魅扫。为国献生命，光辉永世照！”

后来，高玉宝病重住院了。他的儿子燕飞常背着他，在医院走廊里轻轻地踱步。他伏在儿子肩上，听儿子给他哼唱《我是一个兵》这支他最爱听的歌。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”，这是人民军队的初心，也是他的心声。

去年的初冬，在《我是一个兵》雄壮豪迈的歌声中，这位92岁的老兵欣慰地闭上了眼睛，走完了他作为一个战士的一生。

英雄花

■邱守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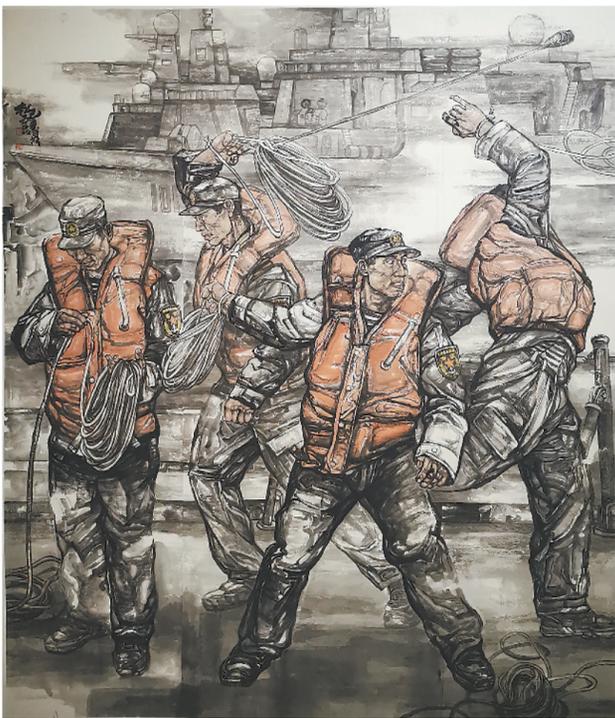
昔日的硝烟早已散去，父亲也已退休。她说，他发现父亲退休后经常一个人伫立在海边。他在感受这和平盛世，他也在想念牺牲的战友。

去年清明节，父亲和我一起参加过边境作战的两位战友长途跋涉，途经多个地方，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吉林松原烈士陵园。松柏青青，芳草茂盛。当年牺牲的通信员就安葬在那座陵园中。那天，父亲从挎包里掏出一瓶珍藏了30多年的“凤城老窖”，这瓶酒是当年奔赴前线时地方政府送的慰问品。通信员将他的那瓶留了下来，相约凯旋之日再痛饮……父亲用洁白的毛巾擦拭着酒瓶上的灰尘，除去瓶盖上的胶布，揩去封口的白蜡。老酒飘香，父亲和同去的两位战友满含热泪，默默举杯对着年轻战友的墓碑，一饮而尽。

父亲曾说过，世间无论什么情，都没有在战斗中结下的战友情重。一次战斗中，父亲他们已经冲出敌人包围圈，后来又毅然决然地再入重围，只因牺牲的副连长遗体还在那里，他们必须把他带回来……

中尉沉浸在远去的硝烟中，眼前是无边翻滚的海浪，远处是自由翱翔的海鸟。好一会儿，中尉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英雄故事是会行走的，它会悄悄走进人的心间，渗入人的血脉，让一个人的内心从此变得坚强和丰满。”

是啊，我一直都相信，英雄是不死的。英雄就像战场上盛开的木棉花，它永远都是春天里，那朵最鲜艳的花。



闻令而动 (中国画)

陈松云作

老兵的战歌

■赵连伟

后，被119师356团选送到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，学习一年。

分别后没几天，老人带着一个厚厚的蓝布包来找我。他在茶几上打开布包，里面是各类证书、奖章、资料，大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他参战时获得并珍藏下来的。有些资料，据说已被辽沈战役纪念馆收藏。每一个证书，都能引出一串动人的故事；每一个奖章，都印证着战争岁月的峥嵘与激情；每一份资料，都书写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变的军人本色……我和老人一起重温着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，感受着血与火对心灵的涤荡。

那天，我顺势邀请老人给官兵讲了一堂课。老人尽管年事已高，可讲起来却激情澎湃，声音洪亮，而且记忆力惊

人。宏观上，他能讲清一个个战役、战斗的背景、顺序、时间轴；细节上，他能讲出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，且讲起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如数家珍。

当年采访过老人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副主任张宁，曾称赞他是“革命的活化石”。

随着交往的增多，我和老人成了忘年交。对这位饱经战火洗礼的抗战老兵，我越发地崇敬。他有信仰，有追求，在他身上最能体现出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。老人有句时常溜出来的口头语：“……我记忆犹新呢！”

最可贵的是，老人仍能唱出30多首战斗歌曲。这或许和他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有关，他当过文书、文化干事、副指导员、指导员……当年上级下发的战斗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一个秋日午后，我和一位中尉聊起对英雄的敬仰。

小时候，农村经常放映露天电影，演的大都是战斗影片。电影在一个村子里放映完，隔几天再到另一个村子里演，我场场不落。那些英雄故事不仅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。看的次数多了，我经常与银幕上的董存瑞、王成一起高喊“为了新中国，冲啊！”“向我开炮！”

在英雄故事的激励下，18岁那年我也穿上了军装。

与我不同，中尉是受父亲影响当的兵。

中尉说，33年前，他的父亲担任侦察连指导员。连里有个通信员和父亲感情最深，每次执行战斗任务，都是他反复检查子弹和干粮带得够不够，防护装具全不全……那是他们侦察连回撤前最后一次执行捕俘任务，通信员请求说：“指导员，身为军人来到前线，我一仗都没有打过呢，这一仗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”连队党支部慎重研究后，同意了通信员的请求。考虑他年龄最小，父亲特意把他安排到相对安全的接应组。清晨，父亲担任捕俘组长率队前出，就在成功捕获一名敌人后撤至接应组地域时，侧翼高地上的敌人突然疯狂地冲了过来。通信员发现敌情后向捕俘组高喊：“敌人上来了！”他边喊边跃出堑壕冲向敌群。双方激烈交火中，通信员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，壮烈牺牲。

父亲说，那一天，战场上的木棉花开得特别红，战友们都叫它“英雄花”。那天夜里，父亲对着通信员的帐篷说了好多好多话，有时说着说着就哽咽住了，只有“沙沙”的风声像是通信员对他的回应……

在前线的400多天里，侦察连经历8次战斗，歼敌32名，俘敌4名，连队先后有6名战友牺牲。

战后，通信员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追记一等功。父亲所在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“英雄侦察连”荣誉称号，父亲被授予“英雄指导员”荣誉称号。



长征

第4736期